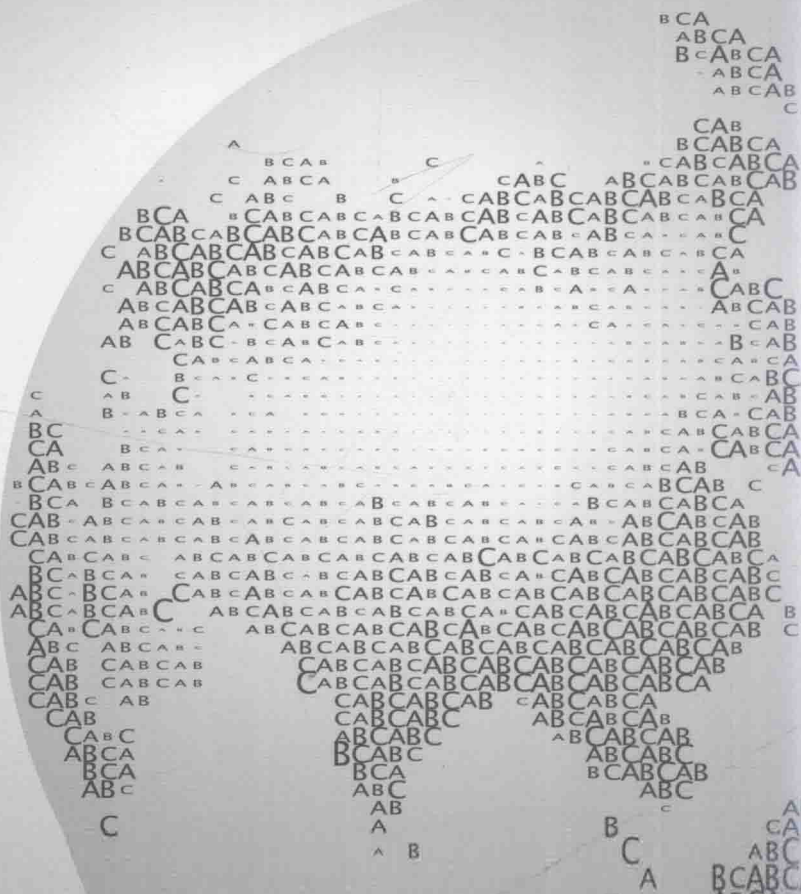


外国语言·文化·传播系列丛书

非通用语特色专业 教学与研究 (第2辑)

[主编] 洪 丽 黄美华 凡保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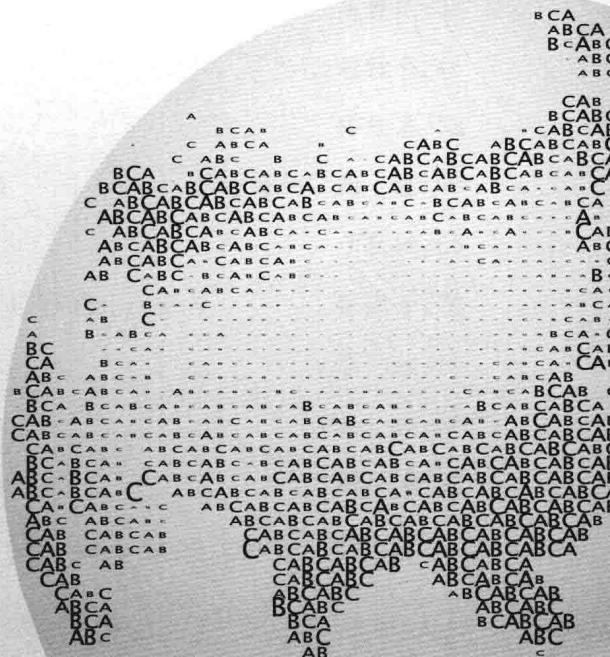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非通用语特色专业 教学与研究 (第2辑)

[主编] 洪 丽 黄美华 凡保轩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通用语特色专业教学与研究. 第2辑/洪丽, 黄美华, 凡保轩主编.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657-0908-1

I. ①非… II. ①洪… ②黄… ③凡… III. ①外语教学—
教学研究—高等学校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0799 号

非通用语特色专业教学与研究(第2辑)

主 编 洪 丽 黄美华 凡保轩

责任编辑 欧丽娜

责任印制 曹 辉

封面设计 风得信设计·阿东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5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0908-1/H·0908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外国语言·文化·传播系列丛书

丛书总主编 胡正荣 李佐文

编委会成员（按拼音排序）

陈明珠 洪 丽 胡正荣 黄美华 李 众
李佐文 梁 岩 阮宇冰 舒笑梅 吴敏苏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上编 语言教学实践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葡语教学	李长森/ 3
中葡口译教学面临的困难和对策	吴新娟/13
巴西葡语水平测试任务难度解析	颜巧容/19
葡语口语教学运用多媒体技术探讨	张方方/31
从过程写作教学法角度浅谈葡语写作教学实践	高静然/38
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刘特平/46
荷兰原版《Help!》系列教材分析与评估	蒋佳惠/53
浅析湖南方言对斯瓦希里语发音的负迁移	李坤若楠 谢 意/60
浅论印度高等教育的教学媒介语言	于秋阳/66
关于孟加拉语翻译教学与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	张潇予/72
接受美学对普什图语高级阅读教学的启示	李 媛/79
英语借词在意大利新闻语言中的应用	杨 柳/86
网络资源辅助意大利语报刊阅读教学策略	付 卓/92

论派生构词法在意大利语精读教学中的运用	朱益姝/99
任务型教学法在意大利语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郭彬彬/107
匈牙利语翻译课教学模式初探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陈煜/115
试析真实语料对提高外语学习者交际能力的重要意义	
——以法语精读课堂教学为例	张戈/120
《日本书纪》“说类词”句式探源	黄美华 马骏/129
日语动词活用形的产出与学习形态	翟东娜/137
中国日语学习者的日语拨音发音特征研究	张林/145
第二外语教学组织形式与教学方法探讨	王玉霞/155
试论网络教学综合平台应用的二三点问题	
——以中国传媒大学优质示范课程网络教学建设应用为中心	段然/163
试论话语的认知模式在日语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段然/171
教师课堂教学中的言语体裁问题初探	凡保轩/180
浅谈俄语教学中的跨文化语用问题	徐洪征/185
非通用语专业英汉翻译课教学的几点思考	郭新/196
“英国社会与文化”测试评估报告与课程改革研究	张彤/202

中编 文学作品分析与鉴赏

从小说《已婚女人》管窥萨拉特·钱德拉爱情小说的创作特色	于秋阳/215
孟加拉文学家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生平及其文学创作浅析	张潇予/225
东南亚地区少数民族的共存与发展	
——读《文明化的边缘》	张静灵/231
《追风筝的人》两个中译本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	李媛/238

下编 国际新闻传播研究

浅析阿富汗真人秀节目产生的原因及其狂欢特性	单 丹/249
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前报纸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	龚颖元/259
以豪萨语广播节目实例分析 BBC 媒体形象塑造	汪 渝/266
新媒体环境下的日本报纸	李立军/276
新闻标题的八种类型	
——以日本报纸网络版的文章标题为中心	刘林利/285
俄罗斯电视犯罪法律节目探究	谢 飞/295
印度媒体在印度社会中的角色扮演	毛佳楠 洪 丽/300

上编
语言教学实践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葡语教学

○李长森

摘 要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面临国际国内双重困难。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继续对中国实施封锁,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亦因为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而分道扬镳。国内方面,由于自然灾害及苏联中断经济援助而陷入困境。为开辟国际空间,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为此十分重视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根据国家的计划与需要,设立了外语系,先后开办了亚非拉国家 23 种语言的本科专业。其中的葡萄牙语于 1960 年创办,北京广播学院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开设葡语专业的高等院校,为中国发展同葡语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支持非洲葡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外交政策;葡萄牙语;北京广播学院

中国的葡语高等教育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中叶。中国与葡萄牙早在 16 世纪就建立了联系。葡人于 1557 年开始在澳门定居,建立了中国与西方发展各种关系的平台,从此中国开始通过澳门了解西方,欧洲亦通过澳门认识国土辽阔的中国。西学东渐及东学西传蔚然成风。然而,在中国与葡萄牙发展关系的四个半世纪中,虽然双方一直通过语言进行沟通,但中国从来没有设立过专门学习葡萄牙语的机构。直到北京广播学院于 1960 年 9 月开办了中国第一个葡萄牙语本科专业。

一、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语人才

中国为何选择这一时机创办葡语专业,与当时的形势不无关系。20 世纪

60年代,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10余年,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当时的国际形势却出现不利于中国的一些状况,导致我国外交和内政均遇到相当大的困难。首先,国际形势在“二战”后变得愈加扑朔迷离,动荡不安。政治上,中国在两个不同领域遭遇挑战: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围堵;另一方面,以苏联为首的东欧修正主义同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造成关系决裂。

新中国成立后至中美建交前的20多年里,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先是发动朝鲜战争,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促使中国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继而投入兵力支持南越政权并对越南北方实施轰炸,又将战火烧到友谊关前。在世界其他地方,由于美、苏两国争霸,危机频生,动荡不安。20世纪60年代更是多事之秋,世界多个地方卷入战乱: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印度入侵中国,印度支那战争,非洲独立运动等。两个超级大国把整个世界带入空前的混乱状态。

当时中国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诸多重要领域发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最初的分歧产生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继而两党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尤其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支持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战争与和平、对新兴力量运动的态度等问题上,分歧尤甚。20世纪60年代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9篇长文进行批判,导致两党公开论战。

中苏关系决裂后,苏联单方面停止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使我国正在进行中的成百上千的重大经济建设项目陷于停顿。与此同时,由于我国过早实行农业合作化,使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打击,盲目的大跃进导致资源浪费,国库空虚,以及连续三年遭遇重大自然灾害,使得亿万人民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面对重重困难,毛泽东于1961年9月9日写了一首古体七言绝句,既表达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关注与担忧,亦抒发了克服困难的决心及希望: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①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政府决定重新调整外交政策,以寻求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进一步扩大国际空间。为此,毛泽东主席先后提出两个空间地带及三个世界的理论,争取团结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新兴力量国家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支持他们维护权益的斗争,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以及顽固坚持少数人统治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为达此目的,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在军事方面,中国不断巩固国防,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提高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防御能力。1964年,尽管经济面临许多困难,中国成功研制并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及核讹诈,确保了中国的安全。同时,对反对帝国主义的前线国家及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或组织提供必要的政治甚至军事方面的支持,最具代表性的是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支持及对非洲争取民族独立运动军事武装力量的支持。

其次,在外交方面,发展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争取更多的朋友,以孤立敌人。在亚洲,支持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拉丁美洲,大力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摆脱苏联控制的斗争;在欧洲,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在非洲,坚决支持新独立的国家人民反对西方国家干涉、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国特别为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建设提供无偿的经济援助。

再次,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不断加强国际领域的宣传工作,向各国人民传播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新成就,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尤其在广播方面,努力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垄断。此前,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了全球广播。例如,美国之音有超过60种语言在世界上广播,而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语言竟达81种。反过来,中国的北京广播电台(后改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仅有不到20种外语广播。

毫无疑问,在上述三点措施中,有两项与语言有密切关系,即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和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均离不开非通用语言。由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转移,外语人才培养从英、俄语言转向小国非通用语。时任中国

① 毛泽东主席于1961年9月9日为其夫人江青在庐山拍摄的风景照创作的七言绝句《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李进是江青的笔名。

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还专门提出新形势下培养 3000 名外语人才的计划。为此,国家对语言人才培养做了分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继续发展传统通用语言教学,设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加强对东欧等语言人才的培养,而第三世界语言人才培养的任务则由新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承担。

第三世界语言亦种类繁多,因此首先设置急需的语言专业。例如,为支持非洲新独立国家突破南部非洲的封锁,打通印度洋贸易通路,中国政府资助兴建达累斯萨拉姆至卢萨卡之间的坦赞铁路,并派出五万多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帮助当地工人建设这个内陆运输的重要动脉,以利于新兴独立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另外,还根据需要提供各种军事援助,派出大量军事专家。斯瓦希里语翻译奇缺,于是,在北京广播学院最早开设的语种中就包括斯瓦希里语。

二、中国第一个葡语专业的创办过程

在其他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的浪潮中,葡萄牙仍顽固坚持对非洲葡语国家的统治。为推翻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等先后成立人运、安盟、解阵、几佛独立党等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中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即开始支持南部非洲葡语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通过非洲统一组织向他们提供大量援助,并且派出多批军事教官分别在坦桑尼亚南部恩加高(Ngagau)和南钦圭(Nachingwea)两地培训安人运和莫解阵(Frelimo)的自由战士。

显而易见,这些训练营地需要大量翻译人员,以便协助中国军事专家对这些武装人员进行政治及军事训练,包括武器的使用及战术技巧。当时,每期以连为建制的百余名人员需要培训六个月,而且他们多为贫苦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学习各种武器及工兵的操作困难重重,需要中国军事专家的反复讲解及示范,对葡语翻译的需求量很大,每期每个营地至少要三名翻译人员才能应付得来,因此,北京广播学院于 1960 年在外语系设立了全国历史上第一个葡萄牙语专业。

北京广播学院的前身是创建于 1954 年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1959 年 4 月,经国务院批准,学校升格为北京广播学院。当时升格为正规大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设立外语系,以便培养日益扩充的对外广播事业所需要的特殊外语人才。为了掌握国际舆论领域中的话语权,国家希望在近期内将仅拥有十几个通用语种及亚洲语种的对外广播节目发展到包括南亚、非洲及拉丁美

洲在内的数十种语言。为此,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已拥有 23 种外语专业。^①

1960 年,来自北京、上海、山东、河北等一些省份的 21 名高中毕业生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葡语专业,组成 60—3 班,创建中国第一个葡萄牙语本科专业。1964 年,60—3 班刚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北京广播学院立即招入 20 名学生组成 64—7 班。1965 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及南部非洲葡语国家武装斗争的深入,北京广播学院一次招生两个葡语班,共 40 名学生,分别为学习巴西葡语的 65—12 班和学习非洲葡语的 65—13 班。显然,中国政府已经考虑到非洲和巴西语言的差异,以利于更好地沟通。

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亦于 1961 年创办了一个葡语本科专业,但由于最初设计学制为五年,且五年招生一次,而五年后正值“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关闭,招生停止,直至 1973 年才恢复办学,但仅从工农兵中挑选学员。至此,北京广播学院成为“文革”前培养葡语人才最多的学校。全国 5 个葡语本科毕业班共向国家输送了百余名葡语人才,北京广播学院就占了 4 个班,近 80 人,这批人也成为中国最早的葡语外交人才及新闻人才。

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办学非常困难。首先,中国与葡语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聘请外教相当不易。最初多通过巴西共产党或国际组织介绍一些热爱中国的友好人士,其中许多人并非教师,甚至有巴西共产党的中央委员、退伍军人、画家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北京广播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甚至共用一位巴西教师教学。即便如此,这些毕业的学生通过努力成为我国第一批优秀的葡语外交官、记者和翻译,为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同葡语国家的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一个巨大的困难是没有教材。当时条件下不可能得到葡语国家的正规教材。每次上课前,中国助教(多懂英文或者西班牙文)将中文文章译成外教能懂的文字,再由外教重新编写或者补充修改,作为课文。因此,当时的油印教材中会发现红军长征回忆录、人民日报社论及忆苦思甜的文章等内容。葡语辞书更是奇缺。许多中学学过俄语的学生不得不借助于俄葡词典,而只学过英语或者不懂任何外语的学生只能千辛万苦设法弄到日葡词典,以帮助对葡语的理解

①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广播被美、苏两个大国垄断,这两个国家的广播发射频率及发射台装机容量均远远大于中国。据统计,“美国之音”装机容量为 8350 KW,莫斯科广播电台为 10000 KW;甚至英国 BBC 和日本 NHK 亦分别有 5000 KW 和 1000 KW,而当时的中国北京广播电台仅有 270KW。

及学习。

还有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是中国正处于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学生们整天饿着肚子坚持学习葡语。笔者曾听 60—3 班一位老前辈讲过这样的故事:当时北京广播学院位于南礼士路的一栋大楼内,教室、宿舍、食堂在同一栋楼内。男生由于饥饿而躺在床上背诵葡语单词,背不出来的人要被罚到一楼食堂买一个馒头分给大家吃。现在听起来是个笑话,但当时七八个小伙子分吃一个馒头无论何时想起来都是十分凄婉的场面。仅此一例就能说明当时学习葡语的条件是多么艰苦。

虽然多数外教并非专门从事语言教学的教师,但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兢兢业业地教导中国学生。第一位到中国教授葡语的是一位从莫斯科来的 30 多岁的巴西女士,名叫马拉(Mara Mazzoncinni),本身职业是一位意大利血统的巴西工程师。虽主修工科,但精通葡、英、法、意、俄五种语言。马拉老师把学生当孩子一样教导,循循善诱。她在中国工作多年,是北京广播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共同教师,直到“文革”爆发前一年才返回巴西。

苏格拉底·奥利维拉·达斯卡洛斯(Sócrates de Oliveira Daskalos)是第一位应邀来华教授葡语的非洲黑人教师,他于 1965 年在北京广播学院 65—13 班教书。他是安哥拉著名政治家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位作家。虽然仅有安哥拉本格拉中学的教学经历,但来华时已经 44 岁,不仅学问高深,而且阅历丰富,尤其是长期的斗争实践及作家生涯,使这位留着小胡须的黑人成为中国学生了解非洲历史文化及葡属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历史的唯一知识源泉。

在北京广播学院工作的葡语外教中,年纪最大的要数贝内迪托·卡瓦略(Benedito Carvalho)。他原是巴西陆军军官,巴西共产党党员,曾参加过 1935 年的起义。笔者于 1990 年赴巴西采访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活动时,曾专门拜访过这位在北京广播学院工作过的老教师。当时这位长者已介耄耋之年,坐在轮椅上,当谈起他在中国的日子仍然十分兴奋,说到他的学生更是精神抖擞,记忆犹新,甚至说得出口他们的名字及有趣的故事,十分感人。

北京广播学院老一辈的葡语学生都十分熟悉巴西教师雅依梅·马尔丁斯(Jayme Martins),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葡语人才的培养。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仅 30 多岁,到华后不久又将未婚妻安热莉娜接到北京成婚。两个女儿均在北京出生。这对夫妇在北京工作数十年,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电台,北

京广播学院几届毕业生几乎都接受过他的教导。如今,83岁的马尔丁斯先生虽然身在圣保罗,但心系北京,仍在精力充沛地为促进中巴两国的友谊而辛勤工作。

三、北京广播学院与中国早期葡语人才

早期从事葡语工作的人多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且在葡语界享誉者众多。60—3班的范维信就是一位佼佼者。范先生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自幼喜爱文学,1960年从北师大附中考入北京广播学院葡萄牙语专业,毕业后到北京广播电台工作。他最大的贡献是将两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巴西人亚马多和葡萄牙人萨拉马戈的十多部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并因此而分别获得中国首届鲁迅文学翻译彩虹奖及巴西和葡萄牙的各种奖项。

在这里,还应提及60—3班的刘正康先生。刘正康1958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由于该校计划开设葡语专业而无师资,便在1960年升入大三时被选派往北京广播学院60—3班作为代培生学习葡语。1964年毕业后,由于上海仍不具备开设葡语专业的条件,他便留在北京广播学院做助教,后到北京广播电台工作。刘正康工作勤恳,不求名利。他的最大贡献是退休之后协助母校恢复停办了30多年的葡萄牙语专业,使北京广播学院再次跻身培养葡语人才的高等学校之列。

虽然北京广播学院是中国第一所开办葡语专业的大学,但恢复该专业并非易事,毕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该专业停办了30多年,重新恢复等于白手起家。北京广播学院决定于2000年恢复葡语专业时,刘正康主动请缨,独自承担了恢复葡语专业的重任。他一人教授从语音、语法到写作的全部课程,并积极联络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和澳门理工学院,将高年级学生送出去,让他们在更好的语言环境中学习葡语。正是以此举为标志,带动全国掀起了创办葡语专业的热潮。

作为中国第一个葡语专业的毕业班,北京广播学院60—3班人才济济。后来成为大使的韩肇康先生也是上海人,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他是葡萄牙问题资深专家,亦是中葡关系发展的见证人。他曾多次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葡萄牙担任主要翻译,并且自始至终参与了中葡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及处理澳门问题的谈判。澳门回归前他担任中葡联络小组的中方负责人,处理过渡期许多棘手外交问题。澳门回归后他担任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专员,直至退休返京。

在文化交流方面,该班陈风吾和刘焕卿最具代表性。两人都担任过中国驻葡萄牙和巴西的文化参赞,在广交朋友的同时,深入研究葡萄牙及巴西的文化,著书立说,为促进中国同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作出很大贡献。

在新闻采访方面,不能不提到新华通讯社的王志根先生。这位来自滹沱河畔的农民儿子在中国同葡萄牙建交之前便以记者身份常驻葡萄牙,为中葡建交做了许多先期准备工作。他曾担任新华通讯社驻葡萄牙记者站、里约热内卢分社以及澳门记者站的负责人。

担任过新华通讯社驻里约热内卢分社社长的还有北京广播学院葡语专业64—7班的陈家瑛先生。由于“文革”的影响,陈家瑛毕业后曾短期下放到北京郊区农村工作,不久即调入新华通讯社。凭借着娴熟的葡语,他很快就熟悉了工作,成为巴西问题专家。

在北京广播电台工作的60—3班的尚京堂永远是葡语播音的男一号,他那带有磁性的男中音及标准流畅的巴西语调感动了成千上万的听众,至今没有人能超越他的播音水准。目前他已经退休,但许多听众还记得他的声音。

65级葡语专业的学生亦业绩不俗,有的人成为北京广播电台葡萄牙语节目的主要播音主持,有的人成为研究巴西问题的专家,有的人担任高等院校葡萄牙语的教授。^①受“文革”的冲击影响,65级两个班的大多数人并未从事葡语工作,但在其他行业亦表现十分出色。如65—12班的俞林根(向党)后来担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后任省文联主席;该班的曹增广任辽宁省商贸厅负责人;65—13班的王成安曾任经贸部援外局局长,后任中国与葡语国家经济贸易合作论坛澳门秘书处秘书长。

在支持非洲葡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前线,亦有北京广播学院65—12班毕业生的身影。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中国应非洲统一组织的请求,在坦桑尼亚南部建立了两个游击训练中心,由中国派出经验丰富的军事专家分别对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武装力量进行每期六个月的军政训练。为保证非洲自由战士听懂讲解内容及军事训练的安全,每个训练营地经常保持至少3名葡语翻译,分别教授步兵、工兵、炮兵等多种科目的武器使用和战术。

① 这些人主要出自于65—12班。如周世秀任湖北大学教授,专职从事巴西及拉美问题研究;李长森博士任澳门理工学院教授,在从事葡语教学活动的同时进行葡萄牙语言文化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并出版多部著作;刘锡斌任哈尔滨大学教授。